

全球智库半月谈

美国制造业真的在衰落吗？

世界杯的经济学

管制会导致资本流动偏转吗？

国际经济政策合作的未来发展

中国经济放缓的政策响应

错误的消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本期编译

陈 博

杜哲元

郭子睿

孔莹晖

李 骁

李 想

刘天培

苏 丹

邹静娴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 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 帆
首席专家	张 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 强	国际金融
	茅 锐	新兴市场	陈 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 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刘天培	科研助理	沈仲凯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 帆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沈仲凯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美国制造业真的在衰落吗？..... 4

导读：美国制造业真的在持续衰落吗？制造业海外分包和产业转移是否真的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作者认为，结论恰恰相反，美国的制造业近数十年都在快速增长，效率大幅提升，而且海外分包有助于跨国企业的国内投资和劳动力市场。

世界杯的经济学 7

导读：2014 年巴西世界杯欢呼与抗议并存。获得世界杯主办权并没有给巴西民众带来他们想要的经济上的改变，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当地人的负担，很多原本规划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一一被终止。考虑到举办世界杯等国际活动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并不高，本文提出寻租行为是各国争相申请举办世界杯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回报率在贫穷国家更高，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在努力铲除腐败现象后，保证贫穷国家可以继续举办类似的大型国际活动。

全球治理

全球价值链的机遇与挑战 10

导读：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既给高附加值的企业带来了机遇，也给低附加值、低技能的企业和工人带来了挑战，可能会加剧不平等程度。

迈向统一的亚洲区域秩序 12

导读：亚太地区正面临转折点。在亚洲各国经历几十年强劲的经济增长之后，这一地区聚集了世界上很多大且有活力的经济体。然而，逐渐增强的经济实力也带动了军事力量的发展，亚太地区目前布满了一触即发的冲突点。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个地区所有国家都在试图重新寻找自身在政治、经济以及国土安全方面的定位。尽管存在维护亚洲安全稳定的共识，一个处理地区之间冲突的组织机构尚未形成。亚洲的发展将会更加繁荣还是会受到地区之间冲突的拖累，至少部分会取决于有效多边机构的形成。

管制会导致资本流动偏转吗？..... 14

导读：资本管制可以帮助管制国限制不稳定资本的大量流入，但也可能对其他国家有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对资本流入的管制有着很显著的溢出效应，一国的管制会使得资本流向拥有相似经济特征的其他国家。

经济政策

泛太平洋伙伴关系的三赢方案 18

导读：即便中美局势日渐紧张，双方仍旧希望能够在经济上合作共赢。其中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将中国纳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虽然经济贸易并不能完全解决双方的争执，但是更加开放的中国必定会保证中美双方的利益。

国际经济政策合作的未来发展 20

导读：2008 年金融危机加强了国家之间的合作，同时美国也在试图避免以后可能出现的衰退。G20 应对危机的手段包括流动性支持、财政激励、财政改革与贸易等。危机中的经验告诉我们，合作的结果远远优于不合作。那么我们应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未来国际经济合作应该如何发展？

中国增速放缓的政策应对 23

导读：拉美影子金融监督委员会（CLAAF）总结了中国增速放缓对拉美地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建议 IMF 通过改革来为拉美国家应对风险提供支持。在 IMF 改革缺乏进展的情况下，各国通过减少进口来增加外汇储备的做法会导致全球总需求下降。

战略观察

枪炮还是黄油？伊朗和南卡罗来纳核电建设的劳动经济学 25

导读：伊朗在完成其位于阿拉克城的 IR-40 增压重水反应堆问题上正面临逐渐增加的困难。幸运的是，伊朗已同意延缓大多数建设工作，以作为其与“欧盟 3+3”谈判计划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伊朗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减少开支，因而是受欢迎的。另一方面，它对于当地人口来说是一个突发事件。本文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罗伯特·凯利撰写。

错误的消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28

导读：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关于寻求制裁委内瑞拉官员的决定，据说与（他们的）暴力和违反人权有关。这一决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可能会被证明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制裁将仅仅会增强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马杜罗政府的声明，（该声明）称其为帝国主义密谋的受害者。这些制裁不仅遭到两位德高望重的参议员的反对（他们明确投了反对票），而且也遭到了委内瑞拉主要的反对派联盟——“民主联盟”和许多独立的委内瑞拉领导人的反对。本文由国际危机组织的哈维尔·西乌尔利萨撰写。

国防预算削减：美国军力仍能威慑中国 30

导读：近来，美国国防开支的削减备受外界关注并引发了相关人士对美国在东亚利益上的担忧。本文作者却力排众议，对美军实力持乐观态度，并从五个方面的对比，分析了中美军事实力的差距，指出美军的相对优势仍将长久保持，不会因国防削减而受到不利影响。

本期智库介绍 32

美国制造业真的在衰落吗？

Theodore H. Moran 和 Lindsay Oldenski/文 陈博/编译

导读:美国制造业真的在持续衰落吗?制造业海外分包和产业转移是否真的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作者认为,结论恰恰相反,美国的制造业近数十年都在快速增长,效率大幅提升,而且海外分包有助于跨国企业的国内投资和劳动力市场。编译如下:

美国的制造业何去何从是一个美国政府和全国民众都关注的问题。但要做到更好地提振美国的制造业则必须建立在对其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不少研究结果都引起了人们对制造业状况的担忧。Baily 和 Bosworth 的研究主要关注制造业劳工人数的下降现象,并把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归结为电脑制造这单一领域的进步,认为其他领域都处于衰落之中。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制造业的增长总体来说是强劲的,并且增长来源多样,绝不仅仅归功于电脑制造领域。我们还考察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竞争效应。对制造业生产率跨国比较显示,在过去两年间美国的表现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要强。此前,不少研究关注的是中国对美出口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所造成的影响。中国出口或导致了劳工间不平等上升和低技能劳工失业等问题,但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我们的研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发现美国跨国制造业企业的海外分包和产业转移实际上和国内投资增长紧密相连,特别是研究开支的增长。本报告对美国制造业的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制造业增速

Lawrance 和 Edwards 的研究指出美国的制造业劳工占比在不断下降,从 1960 年的 28.4% (占非农劳动力总数) 下降至 2010 年的 8.9%。我们的报告显示在 2013 年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至 8.8%。从 2000 年至 2011 年,制造业劳工人数从 1730 万下降至 1160 万。

但劳工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的衰落。制造业实际增加值在 1960 到 2007 年间的年增长率为 3.1%。2010 到 2013 年间这一增速上升至 4%。固然,增速上升的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导致的低基期,但我们也不可忽略研发支出增长和海外分包的影响。

制造业竞争力

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的是,美国的制造业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都在不断增长。研究显示在 1960 到 2007 年间,美国制造业的人均产出每年增长 3.3%,而整体经济年增长仅为 1.6%。从 2010 年到 2013 年,制造业的产出总量和人均产出都比整体经济增长更快。

此外，我们的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的增长不仅仅是依靠电脑制造推动的。交通装备、医疗仪器、机械、半导体等产业都有快速增长。2010 到 2011 年，在电脑制造业下滑的情况下，整个制造业平均增长了 4.7%，比整体经济增速还快。美国的制造业正在变得越来越资本密集型，并且大量投资流向研发支出。

制造业竞争力的跨国比较

2010 到 2011 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增长了 2.19%。在制造业总量的增速上，尽管相比德国 8% 的增速，美国的增速仅为 2.19%，但这一数字已经远高于大多数高收入 OECD 国家。

表 1 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增速跨国比较

Table 3 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 in manufacturing value-added share of GDP for select countries (2010–11)

United States	2.19
World average	-0.99
Germany	7.92
Japan	2.69
European Union	2.62
High income: OECD	2.57
Mexico	1.41
China	0.48
United Kingdom	0.12
Low income	0.10
India	-1.21
France	-1.71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s using World Bank data. Data from China is for 2010 due to a lack of information for 2011.

美国制造业外包的正面影响

美国制造业和全球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报告认为，制造业外包实际上扩大的美国本土制造业的产值和实力。

当前大多数研究关注的都是中国出口给美国制造业劳工和产值带来负面效应。但大部分的研究都存在缺陷。他们关注的是相对的变化，而非制造业的绝对增长。因此，他们的结论只能说明劳工之间的不平等在加大。

Hufbauer, Moran, 和 Oldenski 的研究给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不仅仅关注来自海外的进口，还把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分包效应考虑了进来。他们特别考虑了全球贸易附加值结构的影响。当一件从中国进口的物品中有 60% 以上的价值归属于美国企业之时（就如苹果手机），我们不能认为中国占有了整个制造业环节的价值。

我们的报告也通过自己的计算表明跨国生产有助于提振美国的制造业。使用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进行回归，我们控制了企业的固定效应（包括企业规模，市场力量，所属行业等变量），并控制了年份效应。最终，我们发现美国企业海外雇员每增长 10%，会带来美国国内研发增长 6.2%，同时资本支出、雇员数量和出口各增加 3.8%。海外销售的增长也有同样的效果，而且对国内研发支出的促进更加强劲。

此外，我们发现海外分包的增长和国内服务业的增长有紧密关联，而这一点被不少研究所忽略。全球化促进了专业化分工。海外分包的不少内容都是重复性的简单工种，美国更加专注于设计、市场营销等需要高智力投入的工序。

因此，综合考虑上述的分析，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和直觉相反的结论。由于海外分包能促进跨国企业的国内增长，而且产业转移在持续进行，那么制造业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无法在国外进行投资和分包的企业所导致的。而且很多进行海外分包的企业并非为了转移制造工序，而是为了获得当地的市场。因此，与减少海外分包所对应的后果不会是国内就业的增加，而是减少了进入海外市场的机会。

本文原题名为“The US Manufacturing Base: Four Signs of Strength”。本文作者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6 月载于研究所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世界杯的经济学

Nauro F. Campos /文 苏丹/编译

导读：2014 年巴西世界杯欢呼与抗议并存。获得世界杯主办权并没有给巴西民众带来他们想要的经济上的改变，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当地人的负担，很多原本规划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也一一被终止。考虑到举办世界杯等国际活动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并不高，本文提出寻租行为是各国争相申请举办世界杯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回报率在贫穷国家更高，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在努力铲除腐败现象后，保证贫穷国家可以继续举办类似的大型国际活动。编译如下：

2014 年世界杯，足球回归了它的南美故乡——巴西。巴西是世界上唯一一支参加了所有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球队，也是唯一一支 5 次获得世界杯冠军的球队。然而与历届世界杯所不同的是，本届世界杯欢呼与抗议并存。抗议主要来源于当地民众认为世界杯的举办花费了原本能够用来改善他们生活的财政预算。当然，真正的球迷显然是希望桑巴军团可以在自己的主场获得胜利。然而就目前来看，经济学家则认为巴西已经错过了处理棘手经济问题的黄金时段。

为什么各国竞相申办世界杯？

得益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奥运会、世界杯这样大型活动的成本、收益和流行程度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急速增加（Milanovic, 2005）。举办这些活动真的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么？学术界普遍认为举办这些活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和 GDP 相比，举办大型活动所花费的成本很小；另一方面，举办所带来的收益通常也并不吸引人（Szymanski 2002, Baade 和 Matheson 2004）。

当然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举办世界大型活动可以带来可观的间接收益。Rose 和 Spiegel (2011) 发现大型活动的举办的确会带来一定程度影响：“奥运会的举办通常可以带来 20% 出口额的增加，其他类型的大型活动例如世界杯等也会对贸易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有趣的是，他们发现这些收益不仅仅局限于真正举办活动的国家，也会外溢到申请举办的候选国。

Brückner 和 Pappa (2011) 认为对大型活动举办的期待度效应可以作为经济收益另一种解释。他们发现奥运会、世界杯以及世博会的举办之间存在很重要的差别，例如举办世博会的国家“在活动开始之前会经历一段人均 GDP 显著增加的时间，但是相对于举办奥运会所带来的期待度影响，这一收益小且短暂。然而与此同时，世界杯的主办通常会对出口产生负作用，而且只会带来政府部门支出的明显增加。”

既然如此，那么世界杯的举办是否可以带来居民主观福利或者幸福感的增加呢？Kavetsos 和 Szymanski (2010) 的研究发现不存在很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猜

想。但是他们也指出，举办大型活动，特别是足球比赛活动，的确和暂时幸福感的上升有一定的关系。

综上所述，尽管有大量的文献尝试度量举办大型活动所带来经济收益大小，但学术上一般认为这一影响并不是很明显。此外，尽管出口增加和幸福感提高假说在理论上很有说服力，但是很难找到充足的证据支持举办大型活动一定可以带来这样的效应。

世界杯的政治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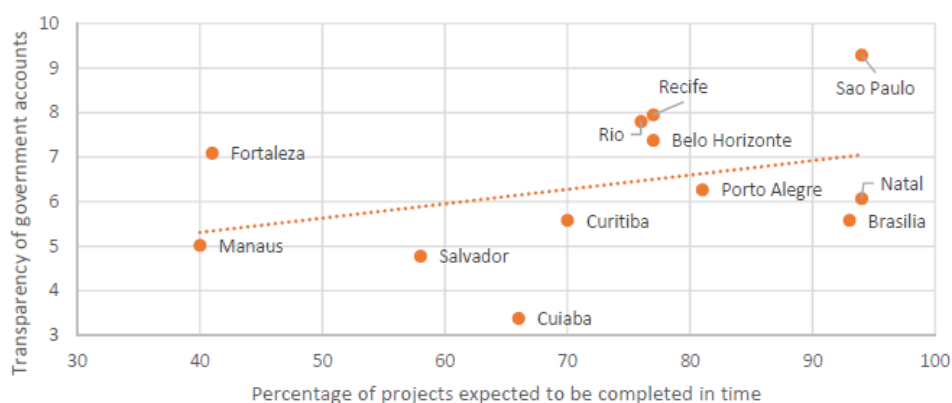
经过 20 年前那场严重的通胀，巴西开始着力解决穷人的问题。多年后，穷人的收入增长幅度比富人大好几倍，越来越多的穷人成为新的中产阶级。对于这二十年巴西所取得的成就，很少有人质疑。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2013 年 6 月份爆发的大规模抗议完全是意料之外的。政府部门的腐败和不称职，选举的劳民伤财等等看起来都可能是当时抗议爆发的主要原因，一些经济学家也警告这些反对的声音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Campos, 2013)。整整一年之后，抗议的确还在继续，但是抗议的理由不再是那么分散，而集中于巴西政府和国际足联在世界杯相关建设上的管理不当和腐败行为。尽管桑巴军团很可能会赢得比赛的胜利，但巴西已经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世界杯。

令人吃惊的是，学术上有关将寻租行为或者腐败作为国家竞争举办大型活动动机的研究少之又少。给定举办大型活动的收益并不是很高，这一假说认为寻租行为是各国竞相争办的原因之一。尽管已经存在相应的理论文章(Robinson 和 Torvik, 2005)，但这一假说并没有受到充分关注。在这一假说的框架下，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看待国家间的竞争行为：企业获得利润，政治家获得贿赂或者“没有预期到的”有助于竞选的贡献。

那么这一假说是否存在数据上的支持呢？事实上，在赢得世界杯的主办权后，巴西政府部门提交了关于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修改方案。与此同时，政府也公开了全部项目的实施进程和具体开支的详细信息。尽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滞后，但这些信息仍然可以用作初步的分析检验。

在世界杯比赛开始前的一个月，巴西一家声誉较好的新闻社 Folha de Sao Paulo 报道了 12 个举办城市的准备情况评估，他们将体育场、城市交通、国内交通、公共安全、电信项目等作为评估对象，并根据完成的实际情况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别：“完成”，“暂时未完成但在世界杯前可以完成”，“世界杯后才能完成”，“停止”。从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大多数的体育场馆已经完成（12 个体育场完成 9 个），但公共安全方面的项目完成度只有 70%，国内交通和电信项目完成度是 50%，城市交通项目完成度甚至仅有 10%。

图 1 2014 年世界杯各城市项目可以如期完成的比例以及当地政府财政收支透明度指数



各个城市项目完成度的不同是否和当地政府财政收支透明度有关呢？图 1 给出了透明度指标（标准化为 0-10，越高的数值代表越透明的政府财政状况）和项目完成比例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弱的正相关关系：当地政府财政账户越不透明，项目完成比例也就会越小。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数据上的限制，这样的结果并不能成为可信的结论。然而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问题的存在。很多学者都很困惑为什么尽管举办国际活动所带来的经济收益非常小，幸福感的上升也仅仅是短期的，但是国家仍然愿意花费如此多的金钱、时间和资源去竞争举办大型活动。我们提出一个新的假说，认为国内某些利益集团可能会出于获得租金的激励从而希望举办大型活动。

为什么说世界杯都应当在贫穷国家举办？

那么上述结论是否意味着只有富裕国家才应当主办大型国际活动呢？显然不是这样。就潜在经济收益而言，奥运会和世界杯之间是存在显著差别的：前者是交给一个城市筹备，而后者则由一个国家来举办。那么为什么应该让贫穷国家主办世界杯，而让发达国家主办奥运会呢？这是由于国际足联要求世界杯的举办应当至少由 8 个城市共同主办，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经济绩效是非常可观的。加之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回报率在贫穷国家显著更高 (Donaldson, 即将发表)。因此，借助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及自身制定的严谨的计划和透明财政收支，贫穷国家设施建设项目的资金就可以筹集起来。而所必须达到的体育场馆的数目要求则可以通过和邻国共同举办的方式解决。

本文原题为“Football in the time of protest”。本文作者为布鲁内尔大学经济和金融系教授，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价值链的机遇与挑战

Gary Gereffi, Xubei Luo/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既给高附加值的企业带来了机遇，也给低附加值、低技能的企业和工人带来了挑战，可能会加剧不平等程度。编译如下：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价值链变得越来越重要，该框架能否被用来推动新自由主义或扶贫开发目标一直受到热烈的讨论。公司间中间产品贸易和贸易任务爆炸式的增长改变了我们对竞争力和全球贸易的思考方式。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学者也推进新的议程，强调全球价值链参与者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预测了经济和社会升级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发生。

全球价值链的地域化和组织化

在过去的十年，全球价值链在地域化和组织化上变得越来越集中。

来自服装、汽车和电子产品,甚至是服务行业的证据表明，全球价值链在地理上往往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特别是集中于拥有大量国内市场和强大供应商基础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全球价值链的领头公司精简他们的供应链，并把策略集中在数量更少、规模更大和更有能力的供应商上。全球的衰退加剧了这一趋势。

成功的定义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当地的供应商可以利用国内的市场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强化他们与全球领头公司的合作，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风险也不可避免。只有拥有较低成本、大规模生产效应和特别技术的企业才能满足国际上关于价格、质量和运输期限的标准，参与全球市场。

那么，什么是全球价值链的成功？最近欧洲政策管理发展中心发表一份关于价值链是否有助于非洲发展的报告。如果一个国家的行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他们不可能培养出专家、制度以及消费者市场来维持行业的发展壮大。此外，供应链合理化的趋势使较小的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发展的担忧促使研究人员扩大全球价值链框架来寻找更广泛的潜在的升级路径，尤其经济和社会的升级路径。

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

经济升级是指通过各种方式提高经济参与者，包括公司、国家和工人，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收入。它反映了生产活动由低附加值端向高附加值端转变的过程。合理的经济升级路径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环境以及经济参与者的能力，这同时也决定了经济和社会的升级是否能联系在一起。

社会升级是指发生在特定企业，关于就业、劳动报酬、工人权利、合同状态、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员工保险安排等方面的改善。最好的场景是社会升级伴随着经济的升级，并给当地的企业参与者带来广泛的利益。

全球生产的扩张是就业的一个重要来源——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洪都拉斯的园艺行业，肯尼亚的旅游行业，以及埃及的呼叫中心。采用常规生产之后，工人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证，工作的质量得以提升，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升级。全球价值链的高标准也提升了部分工人的技能和就业条件。

但是，对于一部分工人来讲结果并非如此。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很多工作是不受保护的，而且这些工人更容易受到全球价值链带来的风险的影响。很多低技能的工作很容易被取消。这些低技能的工人在面临失业风险的同时，他们的人生安全也无法得到保证。

我们该何去何从

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下，很多发达国家逐渐衰退，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过去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不再适用。新兴市场国家需要考虑全球价值链。对于规模较小的国家和企业，采用与周边国家的区域价值链而非全球价值链也许更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所有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会从中受益，但不能保证一定受益。政府可以通过以下渠道提供关键的支持：改善基础设施帮助出口商、当地社区以及小规模的生产者利用国际和国内市场；提高教育和培训标准，培养高技能的劳动力大军；确保一些法规的实施，降低不确定性。如果企业的规模较大、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多元化的市场，他们将从全球价值链中受益匪浅。同时，如果工人拥有高技能、工作环境比较标准，他们也将全球价值链中受益。这些受益的获得不仅需要好的制度和政策，还需要不同价值链参与者的战略合作。

本文原题为“Risks and opportuniti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本文作者分别杜克大学的教授和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4 年 6 月载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迈向统一的亚洲区域秩序

Yan-Ying Huang, Daniel H. Katz / 文 苏丹 / 编译

导读：亚太地区正面临转折点。在亚洲各国经历几十年强劲的经济增长之后，这一地区聚集了世界上很多大且有活力的经济体。然而，逐渐增强的经济实力也带动了军事力量的发展，亚太地区目前布满了一触即发的冲突点。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个地区所有国家都在试图重新寻找自身在政治、经济以及国土安全方面的定位。尽管存在维护亚洲安全稳定的共识，一个处理地区之间冲突的组织机构尚未形成。亚洲的发展将会更加繁荣还是会受到地区之间冲突的拖累，至少部分会取决于有效多边机构的形成。编译如下：

亚太地区正面临转折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人们意识到权力中心正在转移。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繁荣和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强烈对比，则加强了这一意识。然而，随着危机的影响逐渐减弱，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以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可能会再次改变这一看法。亚洲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对于亚洲的发展和繁荣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事实上，两个大规模自由贸易协定，即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正在有效进行之中。然而一个潜在的问题是，TPP协议成员国中不包含中国，而RCEP则没有邀请美国参与，这使得人们对两个协定最终实际有效程度产生很大的怀疑。尽管贸易协定的出现是很好的开端，但彼此竞争的贸易结构是不利于发展的，两个协议的结合对于这个地区所有国家来说肯定是最好的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出现不应当被看作是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彼此之间存在高度的经济依赖性，中国和美国应当共同努力构建一个有效的区域贸易结构。

能源和渔业资源对经济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亚洲地区之间在有限的石油、天然气和渔业资源上的竞争是导致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进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由于稀缺资源所造成的紧张气氛，但是如果国家能够意识到可以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利益，由于资源开采带来的冲突就会有所减少。

当然，要在亚洲实现统一区域秩序建构的目标，最大的挑战仍然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例如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稳定，使得这一进程举步维艰。尽管促成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努力已经持续很多年，北韩核武器实验仍在进行。无论是提供激励还是政治施压，都无法阻止平壤进行核试验，这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担忧。旨在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也陷入停滞。2009年朝鲜宣布退出之后，六方会谈至今一直没有复会，被普遍认为已经名存实亡。重启六方会谈并商讨出一个可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可行方案将会极大地促进亚洲地

区的稳定。事实上，南韩信任外交政策的提出，中国和南韩的交流等等都是很好的迹象。

历史和领土争端也会极大地威胁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的领土争端短期之内很难得到解决。然而，尽管存在争议，但仍然应继续努力。事实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组织（multilater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 HADR）在解决争端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HADR 的合作可以充当彼此建立信任的途径，从而使得区域之间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努力尽管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仍然会带来一个良好的开端。

事实上，亚太地区国家以及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和精力以试图建立统一区域秩序。从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到东盟国防部长会议(ASEAN Defence Minister' Meeting-Plus, ADMM-Plus)和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 , EAS)，都极大地促进了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一些非传统的途径，例如 HADR 之间的合作，也会帮助建立稳定的地区安全秩序。

亚洲地区所有国家都清楚一个和平繁荣的未来并不能够仅仅建立在假想上，积极主动的努力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不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军备竞赛和不断的竞争会使得地区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亚洲地区和整个世界也会因此而变糟糕。任务的关键仍然在于一个有效的合作机构的建立。。

本文原题为“Toward a Unified Asian Regional Order”。本文作者 Yan-Ying Huang 是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博士候选人，太平洋论坛的年轻领导者；Daniel H. Katz 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太平洋论坛的年轻领导者。本文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载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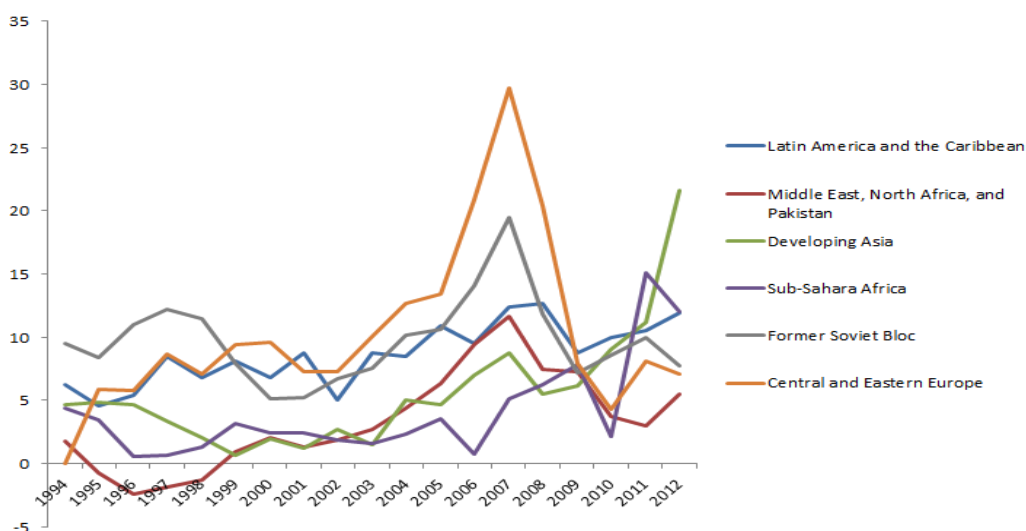
管制会导致资本流动偏转吗？

Paolo Giordani, Michele Ruta, Hans Weisfeld, Ling Zhu /文 李想/编译

导读：资本管制可以帮助管制国限制不稳定资本的大量流入，但也可能对其他国家有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对资本流入的管制有着很显著的溢出效应，一国的管制会使得资本流向拥有相似经济特征的其他国家。编译如下：

近年来，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规模和波动率都有显著上升（图 1），这一现象使得许多经济学家提出建议，要建立管理这些资本的国内政策和多边制度。IMF 重新审视了其对于资本流动自由化和管理的立场，承认“改善并协调金融部门的政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 1 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规模



问题的实质在于：一方面，资本管制可以帮助降低大量流动性较高的资本流入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这些管制政策可能对于其他国家有溢出效应，会引起一些协调的问题，并影响他国政策的制定。

资本管制的政策究竟是如何在国家之间传导的？这种溢出效应是否有经济意义？理解资本管制带来的外部性，是改善金融部门多边合作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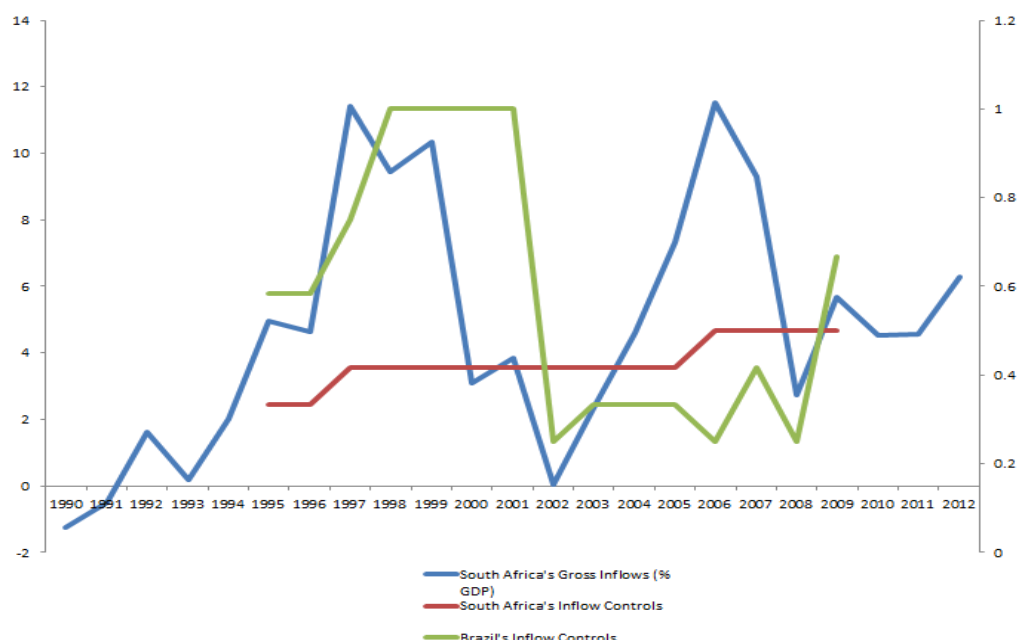
一个例子：巴西管制，流入南非

从图 2 可以看出南非的资本流入与巴西的资本进入管制之间的关系¹。2009 年，巴西对资本流入的管制加强，对流入的股票和债券收取 2% 的税收就是其中

¹衡量资本管制程度所使用的是基于 IMF 关于各国资本管制研究报告的 Schindler 指数。

一项措施。是巴西管制政策的变化影响了南非的资本流入吗？从图上来看，巴西资本管制程度和南非资本流入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这背后也可能有其他解释。而且，即使因果关系真的存在，这一溢出效应的大小也很难衡量。

图 2 巴西的资本管制与南非的资本流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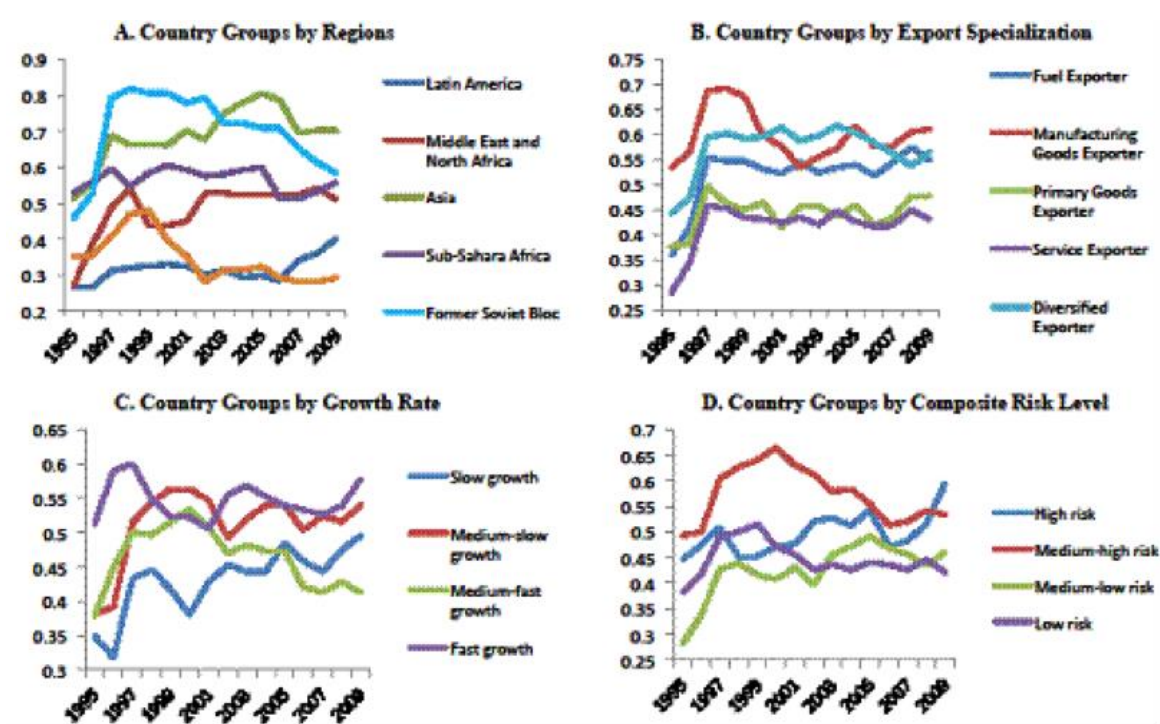
资本流动偏转

直觉上讲，一国资本流入限制的增强，会降低外国资本进入该国所能得到的收益，从而使他们将资金投入到其他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资本流动偏转”，这一概念与“贸易偏转”类似。

接下来看是这种外部性是否能从数据中得到验证。之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都依靠事件研究法，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提供关于流动和管制的细节信息，但常常被人诟病的一点是，特定事件的结果对其他情形是否有借鉴意义。

最近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大样本研究，研究对象是大量发展中国家，时间跨度从 1995 年到 2009 年。他们使用资本流入决定因素的标准模型，并加入一个衡量流入管制溢出效应的变量。如图 3 所示，分别依照地理位置、主要出口产品、增长率和风险水平将国家分组，再看组内的资本流入管制程度。

图 3 资本流入管制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管制非常显著地使得资本偏转进入风险结构相似的国家。同一区域内的溢出效应很小，这说明投资主要由经济特征而非地理位置决定。就巴西和南非的例子而言，据估计，巴西 2009 年的管制，使得南非的资本流入占 GDP 比重上升了 0.5-1.0%。通过一系列检验，这些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运用：中国自由化的溢出效应

以上的研究成果对于回答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溢出影响也非常有用，例如，如表 1 所示，可以预测中国完全放开资本管制之后，其他经济特征相似国家资本流入规模的降低程度。尽管这只是比较静态分析，忽略了一般均衡的影响，但仍然可以提供许多有用的信息，比如哪些国家受到的影响可能最大。

表 1 预测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影响

	Change in gross inflows as a share of GDP				
	Chile	Mexico	Malaysia	Russian	Poland
Lower bound	-1.96	-2.11	-1.97	-2.20	-2.01
Upper bound	-4.47	-4.82	-4.48	-5.01	-4.59

总结

虽然从福利的角度，资本流动偏转或许影响不大，但理论工作已经证实，当政府的政策工具有限时或市场不完全时，资本管制的溢出效应可能导致非有效均衡。在这些情况下，需要多边规则帮助各国内部化资本流入管制对其他国家的冲击。这将有助于改善国际金融体系。

本文原题名为“Do capital controls deflect capital flows?”。本文作者分别为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LUISS Guido Carli University)经济学助理教授、IMF 战略与政策分析部高级经济学家、IMF 战略与政策分析部主任、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候选人。本文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载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泛太平洋伙伴关系的三赢方案

Adam Posen/文 刘天培/编译

导读：即便中美局势日渐紧张，双方仍旧希望能够在经济上合作共赢。其中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将中国纳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虽然经济贸易并不能完全解决双方的争执，但是更加开放的中国必定会保证中美双方的利益。编译如下：

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蔓延到了经济争端之中。双方需要进一步行动起来，才能保证经济利益不受伤害。为了双方都能达成各自的目标，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将中国纳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这个措施能够带来明显的经济收益。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计算，将中国加入现有的 TPP 中，可以在未来十年给中国带来 4.7% 的 GDP 增长；美国则可以获得 1.7% 的 GDP 增长；日本则是 4.4%。这确实是三赢策略。中国的收益还不仅局限于此，因为深入的贸易伙伴关系还可以促进中国的国内改革。

更进一步地说，只有 TPP 能够持续进行下去，所有主要参与国的利益才能够增加。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中国没有不能迅速加入 TPP，中国的贸易增长额度则只有迅速加入时的 10%。所以说加入 TPP 对中国是一件好事。而对日本来说，中国如果不加入的话，那么日本的增长则只有一半，即 2.4% 的 GDP 增长。美国的增长也会受到影响，只剩 0.5%。这说明，大国之间的合作能够提升贸易收益。

但是大洋两岸对于中国的加入都感到犹豫。一些美国人希望合作条约只包括中国的东部民主化程度高的沿海地区，而非整个大陆。而另一些即便本身对中国没有恶意的美国人也认为，中国的加入会让中国有机会限制他们的经济增长。

中国也持有相同的担忧。此外，部分中国人还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和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使得中国的地位十分尴尬，因为这使得中国的贸易地位低人一等。他们希望中国能直接参与到贸易规则的协定之中，而不是仅仅被动地加入协定。

但是这两种观点不够全面。TPP 事实上就是一种开放的区域主义。任何开诚布公的谈判都会被认同。正如上面所说的，中国的加入对其它的国家都非常有利。尤其是中美日三国之间的桥梁会使得整个协定受到欢迎。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中国的观察家担心加入 TPP 仅仅是加入 WTO 的重复，没有任何实质进展；美国的观察家担心贸易成为排斥其它国家的手段，同时还使得本国的利益受损。实际上要达成双边共赢，国家间不能没有妥协精神。如果国家主义占了上风，合作就无从谈起。

如果其它国家对中国的国企或知识产权的担忧使中国不能立即加入 TPP, 只要中国能够表达出足够的诚意, 话语权与主动权仍旧掌握在中国手中。未来若干年之内, 中国严打盗版的行动可以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赢得相当的利益。

所以美国应该在即将举办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向中国发出邀请。中美对于中国拥有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应该达成共识。贸易的确不能解决中美冲突, 但是这些冲突不是不可调和的, 深刻的合作可以减少国家冲突, 解决方案也会更为多样。而中国即将到来的改革会为中美带来共同利益。

本文原题名为“A Win-Win-Win Solution fo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本文作者为彼得逊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6 月刊于研究所官方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国际经济政策合作的未来发展

Tamim Bayoumi and Stephen Pickford /文 邹静娴/编译

导读：2008 年金融危机加强了国家之间的合作，同时美国也在试图避免以后可能出现的衰退。G20 应对危机的手段包括流动性支持、财政激励、财政改革与贸易等。危机中的经验告诉我们，合作的结果远远优于不合作。那么我们应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未来国际经济合作应该如何发展？编译如下：

全球化的大趋势以及日益加深的区域内协作（尤其是欧盟内部）都使得过去几十年各国经贸政策协同性大大增强，也使得政策的外溢性（spillover effect）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这次金融危机更是让人们看到了一国的经济政策可能对其它国家产生及其重大的影响。

我们回顾这次危机期间各国政策协调过程后，可以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危机爆发之初，各国都普遍采取了积极的协作姿态，尤其是在财政刺激政策方面。当时出于对全球经济可能由短期衰退陷入长期萧条的担忧，以 2008 年 11 月的华盛顿峰会（The Washington Summit）为标志，各国开始对以往金融监管政策进行反思、总结。与此同时全球协作的参与者也由以往的发达国家逐渐扩充为新兴市场和更多发展中国家；但这种政策合作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很长，随着一些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如美国的量化宽松和日本的“安倍经济学”）的推出，其他国家对这种“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纷纷表达了不满。讨论的焦点也从最初的政策合作可能带来的好处逐渐转变成非常规政策可能产生的恶果。作为应对，“宏观审慎”作为一剂稳定经济的药方被反复提及；近期的情况是国际政策合作仍未间断（以 G20 峰会为代表），但是跨国经济协调的范围有所缩小，目前主要集中于欧洲国家内部。

这种国际政策协作的式微，由以下几方面原因导致：其一是随着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退，复苏迹象出现，全球性衰退的威胁有所减除，各国融入国际协作的动力也都不复当初。以美国为例，2008 年 10 月美联储与全球 14 家央行达成了流动性互助的协议，并承诺可以对部分国家提供无上限的流动性支持。但在执行上来看，现在这种央行间的“背书”只局限于极少数对美联储自身有帮助的盟友内部。同时当初签署的双边互换协议目前实际只有单向流动，即美联储单边向其余央行提供美元流动性。除了货币协议外，财政政策协作也面临着瓦解。早在 2008 年以 G20 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阵营共同决议将全球 GDP 的 2% 用于财政刺激政策，但随着各国经济情况分化日益严重，这项意见在执行上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阻力，尤其是来自各国内部的政治压力。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各国始终不能在政策外溢效果的评估达成共识；换句话说，尽管人们普遍认同一国经济政策存在外溢效果，但这一影响究竟有多大、持

续时间会有多长,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媒体讨论中都无法得到统一答案。事实上,国际政策协作上的学术研究由来已久。以货币政策为例,在经典的“蒙代尔-弗莱明”理论模型框架下,一国货币政策对于本国的效果是明确的,但对于其他国家的产出影响却是无法判定的。此外,如果将企业价格对汇率波动的调整纳入考虑,则会进一步增加结论的不确定性;政策评估的分歧还体现在对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日本“安倍经济学”的争论上。不同于以往旨在改变整体利率水平的货币政策,上述做法是通过影响收益率曲线来影响社会融资成本,进而拉动本国经济,这也就使得以往的政策讨论结果不再适用;同时日、美两国的宽松政策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对于这种短期资本流入的效果,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专家学者也是各执一词。

除此之外,尽管有学者在理论上证明了协作能够给所有参与者都带来好处,但实证结果显示这种互惠共赢的效果十分有限,并且取决于各方当前政策(如现行的汇率政策)。举例来说,研究发现当一国原本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度时,此时国际合作就可能并非最优选择,因为一旦该国采取“以邻为壑”的策略或是盈余国不愿承担更多的义务,都会使得协作效果大打折扣。与此相对,无论是来自那些实行固定汇率国家还是货币联盟内部经济体的经验都一次次证明了,固定汇率下各国采取“各扫门前雪”的做法反倒会成为一种次优选择。

未来对于外溢效果实际大小的讨论仍将继续,在这方面,IMF等国际组织可以做出一些有利的尝试。不过即使人们认同国际协作的重要性,在操作上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弄清:第一,合作的可持续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基于规则的制定还是相机决策;第二,合作的参与方究竟是以更为相近(这包括意识形态、财政状况等诸多方面)还是更为多元为宜;第三,政策协作的推动应该交由利益相关方(如国内立法机构、国有企业、工会等组织)还是更为独立、客观的第三方外部机构。

上述问题的答案还得取决于所针对的问题,尤其是议题的“技术性”和“政治性”孰强孰弱。我们的建议是:对于那些在较为同质国家间进行的技术性问题,如贸易政策,应更多地基于规则制定;而对那些异质性较强国家间、政治意味很浓的议题,事后评估、相机决策的方式可能更为适宜。总的来说,基于规则的政策协作更多适于维持某种既有政策,如危机期间延续贸易自由化,防止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对于那些需要破除重重坚冰的改革性议程(如WTO谈判中的多哈回合),小范围的非制度化讨论可能更为现实。

总体而言,目前各国普遍都认识到了国际协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货币、财政和宏观金融领域。金融危机让人们看到国际协作带来的好处,尤其是在危机爆

发早期，同时这种改革的收益并非线性，而是在极端情形（如利率水平已经接近于零时）将更为明显。

在政策协作的具体执行上，需要视具体议题制定相应的规则、界定参与国范围以及改革执行主体。对于那些事前已有基础的政策协作，可以尝试在小范围、较为相近的国家间优先推行；而对于那些改革阻力较大的问题，应吸收更为多元的利益相关方，听取各方意见，充分考虑到改革难度。

未来对于政策外溢效果的评估还有待深入，尤其是对那些极端政策（如超宽松货币政策和零利率政策）。有关效果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是利是弊”的定性讨论，还应细化到具体的影响大小、作用范围、持续时间。只有当各国在政策影响效果上逐步达成一致，政策协调程度才有望上升。

本文原题名为“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Cooperation Dead?”。本文作者 Stephen Pickford 是 Chatham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Tamim Bayoumi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审查部的副主任。本文于 2014 年 6 月载于 Chatham 研究所官方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增速放缓的政策应对

James A. Haley / 文 孔莹晖 / 编译

导读：拉美影子金融监督委员会（CLAAF）总结了中国增速放缓对拉美地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建议 IMF 通过改革来为拉美国家应对风险提供支持。在 IMF 改革缺乏进展的情况下，各国通过减少进口来增加外汇储备的做法会导致全球总需求下降。编译如下：

拉美影子金融监督委员会（CLAAF）最新的报告分析了中国增速放缓对拉美地区的影响。CLAAF 认为影子银行产生的信贷扩张、房地产等部门过度投资等问题会导致中国 GDP 增速放缓，并通过以下四个途径对拉美地区产生影响：

- 其一，导致拉美地区物价走软。在过去几十年间，物价是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物价走软会对该地区财政平衡带来负面影响，并导致资本流入减少，甚至出现资本流向逆转。
- 其二，可能引起全球大范围的重新定价。这可能会导致新兴经济体资金撤离拉美国家。
- 其三，中国对拉美国家的 FDI 可能下降。而在过去几十年间，来自中国的 FDI 是拉美地区越来越重要的资本来源。
- 其四，银行间联系或成为传染源，因为中国的银行在拉美地区的流动性在下降。

为了应对以上风险，CLAAF 建议拉美国家在 IMF 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下，进行金融、财政和外部脆弱性的压力测试。同时，CLAAF 认为 IMF 应该加强扮演国际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能力。由于在这点上缺乏有效措施，各国应该建立外部流动性缓冲机制，维持与风险相对应的充足外部流动性水平。

拉美国家可以通过借贷（承担外汇风险）或增加外汇储备积累速度来建立外汇储备，前者可能会因为美联储退出 QE 而难以实现。同时，这些国家也可以通过减少内需（消费、投资、政府支出）来增加外汇储备。其结果是进口相对出口减少。但这只是一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并非所有国家都可以采取。如果该措施对拉美地区而言是可行，那么对于亚洲地区、欧洲新兴经济体等其他地区来说也同样可行。因此，如果所有国家都试图增加储备，其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将减少，最终导致全球总需求下降。

这正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情况。当时各国都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来减少进口以实现贸易盈余。当然，如果一国不能出口，其收入减少，最终进口也会减少。结果是全球总需求不足。防止这样的情形出现正是成立 IMF 的初衷。

那么问题在于：由于 IMF 治理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从各国自身来看合理的做法整体来说却是不合理的。当前，在中国增速放缓，欧元区面临日本式

通缩风险、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处于长期停滞边缘的背景下，美国不作为的代价会远高于美国国会僵局带来的后果。

本文原题名为“Policy Responses to Chinese Slowing and the Architecture”。本文作者 James A. Haley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员，Joseph E. Gagnon 为美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本文于 2014 年 6 月 5 日刊于 CIGI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枪炮还是黄油？伊朗和南卡罗来纳核电建设的劳动经济学

Robert Kelley/文 李骁/编译

导读：伊朗在完成其位于阿拉克城的 IR-40 增压重水反应堆问题上正面临逐渐增加的困难。幸运的是，伊朗已同意延缓大多数建设工作，以作为其与“欧盟 3+3”谈判计划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伊朗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减少开支，因而是受欢迎的。另一方面，它对于当地人口来说是一个突发事件。本文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罗伯特·凯利撰写。编译如下：

国内获益

一直到此次延期为止，伊朗都在白费功夫，建设着一个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反应堆计划，该计划几乎没有用处，而且与其初始目标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其初始目的）是为伊朗的医疗产业生产医用同位素。这个反应堆对该目的来说太大，对于提取医用同位素来说并不理想，而且离消费者太远。也许，在 20 世纪 90 年代构思和设计这一反应堆的时候，它就被预期是能够支持武器项目，但建设的拖延、技术的困难和作用的改变使其成为无用之物。德黑兰可能也承认需要在此处节省开支，以抵消制裁（带来的损失）；该计划就把自己赠给了这一行动。

评估其对当地经济的效用

阿拉克是中央省的首府。对于中央省的就业和经济来说，阿拉克增压重水反应堆计划意味着什么？谷歌地球影像的快捷浏览表明，在 2003 年，阿拉克的伴生重水反应厂的建设正在进行，大多数外部建筑及大量管道和技术设施已完工。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将重水生产厂从一个概念通过设计阶段再到成为现实的 2003 年，可能已过去了 10 年时间。10 年内日益增加的建设预算、雇工和设备由当地居民买单。如果真能在 2006 年投产，它将会是当地经济的一个摇钱树，且仍会产生巨大动力。

在 2003 年的谷歌地球影像中，未来的反应堆只是一个梯度场。伊朗计划在 2009 年或 2011 年使这一反应堆投产，但直到 2014 年，它仍未完成。造成拖延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明确的一个原因是缺乏燃料。伊朗费了很多年也没生产出反应堆所用的燃料。难怪他们在电视中展示的燃料形式很难适用于这一级别的反应堆。还有报道称，他们直到最近才开始零功率配置的临界值研究，设计过程出奇得慢。

部分困难可能在于对 IR-40 燃料的包覆。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董事会的报告，伊朗在几年的工作之后仅生产了 10 根燃料棒，且没有一根是 2013 年以后生产的。很明显，伊朗能生产燃料球，这也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的。但电镀厂可能仍未有效工作，这就留下了一个没有燃料也没有作用的反应堆。国际原子能机构并未正式核查电镀厂，因为它未被法律定义为“核设施”。像这样的案例，国际原

子能机构需要在其与伊朗达成的当前协议下申请参观。要建成零功率设施，电镀厂不需要足够的热负荷，但在真正的反应堆中，它需要有很高质量。

谁是 IR-40 建设开支的受益者？很明显，当地的建设者和作战部队会受益，但它也对伊朗革命卫队有着巨大的好处——他们做出关键决策且大权在握。大笔的钱和大批的合同带来大量收益。停止 IR-40，而去与“欧盟 3+3”达成协议，使这些都处在危险之中。因此，从其开始之日，该计划拖了很多年，因而其慷慨性仍可能持续。

与其他核项目进行比较

这是一个新情况吗？不是。在利比亚，有几百万美元投入了预想中的核项目。然而，很少有钱真正花在了核项目上，大部分钱被花在了金表上，或成为了瑞士银行的存款。

现在，鉴于“欧盟 3+3”协议，IR-40 的建设停止了，阿拉克的市长必须想尽办法为当地经济找到更多替代的就业岗位和收入。如果他需要一个盟友，他可以找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尼基·海莉，她也面临几乎同样的问题，即在萨凡纳河区建设混合氧化物燃料厂——这是一个耗资至少 30 亿美元的计划，（目前）只有 60% 完工。该计划的监工——美国政府，苦于进度太慢和不断膨胀的成本，正在重新评估建议取消或“冷备份”这一计划。这一计划邀请了许多防扩散专家，他们重新考虑了这一设备（究竟）会减少还是会增加扩散风险。

南卡罗来纳的逻辑是简单的。不管成本是否超限，这一地区都丧失了 1800 个就业岗位。再看看 IR-40 的建设，这表明伊朗的问题同样严重；几百个就业岗位危如累卵。

这是一个为人熟知的现象。在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伊拉克电厂主管说他的员工里有“400 个园丁”。他解释说，在中央计划经济中，无论他的电厂有多少配额，他都被强迫去雇佣相当数量的当地人，因此园艺工就是为那些失业者选择的职业。事实上，该地美化和养护得很好。

“枪炮还是黄油”

在最近的一份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很罕见的外交声明中，南卡罗来纳特别指出，关闭（核电）工厂将会导致美国违背其与俄罗斯达成的削减钚库存的国际核不扩散协议。讽刺的是，不论当前的差异如何，这都是俄罗斯和美国应继续合作的一个领域。

观察家们指出，伊朗有很多年都在追求一个可疑的计划——特别是据称官方已经在 2004 年停止了对核武器的兴趣。看看建设的时间轴，无论在伊朗还是南卡罗来纳，设计和建设资金的拨付，以及对当地团体作出的承诺，都能使人们理解该计划延续下去的真实动机。

美国政府将不会投资一个已经在预算上失控的计划。海莉州长担心她的选民们将会因受害者而终止这一决策。要是采访阿拉克的市长，看看他的目标和限制条件有哪些，将会十分有趣。

“枪炮还是黄油”这个短语与一个为人所熟知的模型有关，用来解释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两种东西之间的关系。在阿拉克计划这个案例中，核武器项目可以被看作枪炮，而生产医用同位素则可以被看作是黄油。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什么东西更容易煽动国际危机——政治化的枪炮还是黄油？

本文原题名为“Guns or butter? The economics of nuclear construction workforces in Iran and South Carolina”。本文作者罗伯特·凯利 (Robert Kelley) 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4 月 4 日刊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错误的消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Javier Ciurlizza/文 李骁/编译

导读：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关于寻求制裁委内瑞拉官员的决定，据说与（他们的）暴力和违反人权有关。这一决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可能会被证明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制裁将仅仅会增强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马杜罗政府的声明，（该声明）称其为帝国主义密谋的受害者。这些制裁不仅遭到两位德高望重的参议员的反对（他们明确投了反对票），而且也遭到了委内瑞拉主要的反对派联盟——“民主联盟”和许多独立的委内瑞拉领导人的反对。本文由国际危机组织的哈维尔·西乌尔利萨撰写。编译如下：

委内瑞拉确实正经受着一场严重的危机。正如国际危机组织在其新报告中着重指出的那样，它确实需要外界的帮助——两派的分化非常严重，而他们不可能独立解决彼此的分歧。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一场对话于4月中旬开始，这得到了地区组织——南美国家联盟和梵蒂冈教廷的支持，但仍然缺乏公信力。特别是对于反对派来说，它的席位事实上已被冻结。委内瑞拉主要的地区性和更高层次的国际伙伴的推动至关重要。但这必须建立于明确的目标和为达到它们的持久战略之上。

经济和政治的制裁仅仅可能是一个广义外交战略的工具，它源于对政治背景的一种全面认识。虽然在最近举行的总统大选计票中不一定完全存在疑问，但马杜罗政府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它代表了很多的委内瑞拉人。“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总是强调摆脱危机的政治出路，即使包含深度的改革，也必须限于委内瑞拉的宪法框架之内。美国的制裁不可能在这一地区得到支持，它也不与南美国家联盟的调解联系在一起。（这些制裁）似乎很少是被设计用来促进委内瑞拉的问题解决，而更像是美国公众意见的串联。

由南美国家联盟和诸如梵蒂冈这样的其他行为主体支持的对话应当继续下去。当然，很明显这个对话不可能永远僵持下去。到目前为止，政府对于缓解分歧或否定坚持强硬路线的人不抱太大希望，这些人继续把反对派称为“反叛者”。这一对话仍被看做简单的交谈。它必须成为双方都能做出妥协的严肃谈判。

尽管坚持强硬路线的人不仅仅站在政府一边，反对派中的激进分子声称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颠覆现政权，他们大声呼唤着所有可能的制裁。这并不是大多数反对派以及其较为温和的领导人或许多受人尊敬的委内瑞拉人士的立场。但一些极端主义为政府拒绝改革提供了辩护。

委内瑞拉面临着一场极端严重的经济下滑和整个（南美）大陆最令人担忧的犯罪浪潮之一。这需要团结一致来处理这些挑战。重建分权（制度）至关重要。其直接措施应包括对独立个人的承诺，它由两派（政府和反对派）、最高法院、总检察长办公室和目前其授权已过期或即将过期的督察专员一致同意。亲政府的

民兵“团体”和其他非官方的武装组织必须缴械。要做到这一点，双方都需要确信，无论对话中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都不会遭到报复。

如果认为委内瑞拉政府将自愿让步或仅仅是基于诚意，那就太过天真了。国际社会——邻国、地区大国和地区外的伙伴——必须向双方施压，以使其同意不加强一方或另一方的力量，而是重建法制并保护人权。南美国家联盟必须更大力度和更加明智地推动（这一进程）：没有一个明确的架构和时间表，谈判将会面临每天都在摇摆的风险，这种摇摆仅仅基于盛行的政治情绪。像联合国这样的多边机构也不应忽视这一危机。它们应当在技术性的专业知识上为组织这样的对话提供便利。如果它（对话）停止了，不管能达成什么协议，都要考虑任命一个国际主持人来推进或监督其实施。

美国的单边制裁并非为这些目标服务。恰恰相反：它有再次陷于拉丁美洲令人疲惫的反帝争论中的危险，这加深了该大陆的分化，并使其对于西半球最严重危机的应对陷于瘫痪。

本文原题名为“The Wrong Message: U.S. Sanctions on Venezuela”。本文作者哈维尔·西乌尔利萨（Javier Ciurlizza）为国际危机组织（ICG）拉美和加勒比项目的波哥大主管。本文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刊于国际危机组织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国防预算削减：美国军力仍能威慑中国

Benjamin H Friedman /文 杜哲元/编译

导读：近来，美国国防开支的削减备受外界关注并引发了相关人士对美国在东亚利益上的担忧。本文作者却力排众议，对美军实力持乐观态度，并从五个方面的对比，分析了中美军事实力的差距，指出美军的相对优势仍将长久保持，不会因国防削减而受到不利影响。现编译如下：

权威人士、国会联邦议员，甚至一些同盟国最近都担忧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使命。他们担心五角大楼预算的下降和来自欧洲及中东事务的干扰会削弱美国的战斗能力或战斗意愿。中国可能会大胆借此机会，依靠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实现领土扩张的野心。

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历史上威胁力量的接受国家很少注意到威胁国家在其他地方的做法，他们往往只关注冲突中自身的利益和那里的军事平衡。美国及其亚洲盟国还未失去相对于中国的军事优势，并且现在和以前一样仍有充分理由协同作战。因此，美国国防预算的削减和外国的麻烦不会危及东亚的稳定。

2015 年，奥巴马政府计划在国防财政上花费 5210 亿美元，随后可能还会追加 790 亿美元。如果目前的开支上限保持规律，考虑到通胀的影响，美国的军事支出将会在 2016 年有所下降，比近期的预算高峰 2010 年降低 15 个百分点，2016 年以后又将开始缓慢上升。在没有战争的 2016 年，五角大楼的开支可能会超过冷战时期的平均支出，即使是调整了购买力的差异，其军费数量也大致相当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倍。美国将会把国民财富的更大份额用于军备支出。

当然，军事的总开支很难说明国家间的战斗会发生。这主要依赖于战斗的地理环境和能部署到战斗中的兵力。但这些考虑至少看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及其亚洲盟国将会牵制中国。这里对美中势力均衡很难有一个综合评述，但几个要点却是需要注意的。

首先，在最可能的战争场景中，美国和盟友将会保护海岸线或岛屿。防守比进攻更容易，尤其是应对从海上来的入侵者，正如中国军队攻击日本，捍卫岛屿，或像必须保护台湾那样。陆上的战壕军队能抵挡空袭和击退运送登陆部队的舰船或飞机。

其次，任何美中战争都可能发生在美军相对优势的领域：天空，海洋，甚至太空。尽管中国可以设法使其射击导弹或巡航导弹击中行进中的美国舰船，但其导弹的精确性取决于那些容易受到干扰或直接被打击的雷达。中国几乎没有能力去攻击和摧毁美军潜艇，而这些潜艇却能给中国海军带来毁灭性的大灾难。在中国南海，不像他们的美国对手，中国战斗机将超出范围，其机载预警和控制飞机会提示他们。

不论中国投入多少军费，经验不足和制度缺陷都减缓了中国缩小这些差距的能力。中国的国防工业仍然在努力建造隐形飞机和精确制导导弹。中国人民解放军仍在学习操作目前唯一的一艘航母和控制水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中国军队缺少战斗经验又存在贪污，军官晋升和物资采购奖励通常都会要求回扣。

当然，五角大楼也有自己的收购问题，这也是这几十年海军和空军在舰船和飞机数量上缩水的一个原因。但同时，精确性、监控能力和通信系统的改进使每个平台都更具打击的致命性，从而让军事综合实力变得更强。现在五角大楼正试图维持这些相对优势。削减计划主要针对人员开支，物资采购和运作的账目都会在未来的五年保持相对稳定。

第三，美军可用性的限制常常被夸大。霍克斯宣称全球责任只会使美国一部分军队能应对中国。但是，战争不可能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爆发，而这些危机允许美国调动军队到这些地区，尤其是与太平洋战争最密切相关的航母、两栖攻击舰和歼击机。这种战争将会重要到足以减少其他地方的驻军数量。与此同时，中国有自己的军事竞争对手，比如印度。

第四，美国的核武器远远威慑中国。尽管中国领导人怀疑美国是否会冒险对其盟国进行核战争，这种错误的结果只是为了平息攻击性。中国领导人仍然不能确定他们的核军火库能否幸免于美国的第一次攻击。

最后，很难认定中国将会变得更具攻击性。经济和人口的趋势不利于中国维持其现有军事开支比率。同时，对大战的恐惧缓和了中国的领土野心，哪怕是对日本那样的传统敌对国家。所以，中国跟随了历史上另外一些超级大国，包括苏联。

华盛顿外交政策的精英阶层自恋地采取一种威慑理论。他们看到它在每一个应对麻烦的外交政策决定上摇摆不定。但是东亚的稳定仍然强劲，对美国国会一年一度的政策制定斗争并不敏感，因为对目前所有的主要大国而言，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依然很小。

不过，华盛顿关于战争可信性的错误想法可能会有一个讽刺意味的美德。如果盟国愈加重视美国有关不足轴心和失败红线的评论，他们就会愈加担心，愿意为其自身的国防安全支付更多，从而使美国的纳税人松一口气。让他们也为美国利益挥洒一点汗水吧。

本文原题为“Cut Away :the U.S. military still deters China”。本文作者本杰明·H·弗里德曼 (Benjamin·H ·Friedman) 为卡托研究所国防和国土安全研究的研究员，本文发表于 2014 年 6 月 4 日的卡托研究所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 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斯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 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5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1 名。

网址：<http://csis.org/>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http://www.iie.com/>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http://www.cigionline.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2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6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 1977 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http://www.cato.org/>